



欧洲文化研究丛书

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论

A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李宏图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论

A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李宏图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论 / 李宏图主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3
(欧洲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201-06797-1

I. ①欧… II. ①李…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欧
洲—近代 IV. ①D09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8829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0.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300 千字

定价: 43.00 元

总 序

“欧洲中心论”受到抵制和批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无论是批评的深度还是影响的范围都得到了极大扩展。有关的批评意见多种多样，立场和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其基本结论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共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理论，“欧洲中心论”自然是难以成立的，然而近代初期以来欧洲特别是西欧率先走上“现代化”之路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欧洲在近代初期以后人类发展史上领跑全世界的事实也是不能否认的，进而，以欧洲工业化为主导且其基本格局至今未出现根本改变的世界体系也不能不得到人们的承认。我们并不认同“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但是不得不正视自近代初期以来欧洲特别是西欧（目前扩大到了美国）成为世界中心的历史事实。承认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客观理解当今世界很有意义，对当下的政治外交和文化软实力竞争也不无裨益。

近代欧洲文化引领世界的原因十分复杂。学术界力图扩展研究视野，对以往的研究结论作出更合理的补充。人们注意到中古晚期欧洲特别是西欧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11世纪初以后两百年，西欧社会经济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获得稳定的发展，以沿海和主要交通道路沿线城市发展为推动力的西欧商业贸易网络逐步形成，直接促进了城乡手工业和小商业，带动了农业经济发展和新垦殖区的扩大，欧洲人生活质量总体上得到提高。据专家称，当时垦荒数量和城乡手工业商业人数两个指标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而更为突出的现象是，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欧洲人口的增加。有学者指出，

这个时期欧洲人口“爆炸性的增加”导致“有些地区的单位面积人口甚至达到19—20世纪的水平”。然而，欧洲封建制度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封建地租使地主的利益最大化，而社会下层却严重贫困化。封建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成为欧洲中古晚期危机的基本因素。导致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3世纪以后西欧气候的异常变化，以至于在14世纪初出现了连续的农业歉收和大范围的饥荒。由此而引发的人口损失十分明显，因躲避饥荒形成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更突出。而后出现了被西欧人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这场天灾从地中海传播到整个欧洲，在一两百年间肆虐欧洲，使西欧人口大幅度减少，正常的社会生活被破坏，欧洲人遭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某些谣言盛行的地区甚至爆发了种族骚乱。这样的瘟疫灾难对欧洲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4世纪中叶以后西欧生产总量下降，因为劳动力缺乏，传统的经济结构被迫进行调整。进而导致社会矛盾凸显，在法国爆发了1358年扎克雷起义，在英国则爆发了1381年瓦特·泰勒起义。西欧经济和社会物质生活究竟在这场重大变故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欧洲不同地区此后如何走出危机，是什么因素进一步导致那些地区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存方式，等等，这些问题过于复杂，学术界的探讨也一直在进行。但是有一点学界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从此西欧和整个欧洲开始走在全世界的前列，开始引领全球快速发展的潮流。而世界其他地区都被逐步纳入这个潮流中去，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主动还是被动。

近代欧洲领先发展有目共睹，近代初期整个世界的中心逐步转移到欧洲也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欧洲的经济首先突破中古晚期旧制度的束缚，欧洲的政治也同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总是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出现持久的变革，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也经历了与时代变革同步的改革，欧洲人获得了空前的精神解放，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极大发挥，进而促进科技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欧洲人在新的生存模式中获得了新生，一种进入现代生活的新时代逐步到来。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人们尚未感受到新生活

的气息。建立在农本生活方式基础上的田园生活仍然保持着千百年来的旧习惯，维持着社会生活的慢节奏。农业文明给欧亚旧大陆东部地区带来的辉煌仍然没有完全消退，旧制度仍旧保持其最后的生命力。当旧时代的月色退去时，新世纪的曙光已经露出了地平线。一个欧洲工业文明主导的新时期开始了。

我们使用“欧洲”、“欧洲文化”这类概念只是借用国人约定俗成的看法，事实上，它远比我们理解或者想象的复杂得多。《欧洲文化史》的作者、荷兰人彼得·李伯庚教授在谈到“欧洲”观念时尖锐地评论道：“它是政客，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律师们，按照自己的理想而使用（或有时玩弄）的概念。他们是为了使欧洲不再用武器毁灭自己，而把欧洲看为一个‘文化’或‘文明’，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个统一体；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为推广‘欧洲一体化’而赋予它一个意识形态基础。”他甚至提到，有学者认为“欧洲其实只是19世纪末期的产物”。很明显，地中海北方和黑海西北方那个地区，在生活其中的那些人眼中与我们这些遥远的东方人眼中表现是不同的。特别是在欧洲列强欺辱剥削中国的时期，欧洲常常被我们看做是一个整体，那个疆域面积远比中国小得多的地区汇集的不同民族也常被当做一种“欧洲人”。直到今天，这种在几代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看法仍然没有太大变化，尤其是欧盟推进一体化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的当下，这种观念得到强化。事实也是如此。

“欧洲”这个地理概念虽然早就存在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边界和内涵是不清楚的，至少是变动不定的。而谈到“欧洲文化”或“欧洲文明”，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一个来自德国、英国或者法国的普通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称为“欧洲人”的，谁也说不清。或者他们是在什么语境中自称为“欧洲人”的，也不好确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欧洲特别是西欧的政治家认识到，欧洲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各个民族要么在战争中自我毁灭，要么在联合寻求共同利益中得到发展，他们似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为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

政治家们通过现实经济利益推进欧洲一体化工作，取得了一些发展。最近欧盟“总统”范隆佩的上台被视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政治改革的重大突破，其意义甚至超过了“欧元区”的建立。然而，我们认为，这个成果的取得是欧洲政治家们更为理性的一种协商的成果。这首先表现在，多数欧洲政治家最终找到了欧盟的正确定位，已经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开宗明义指出了这一点，即欧盟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区域国际组织（或者可以理解为欧洲的“联合国”）。至此，关于欧盟最终实现“联邦制”、“邦联制”、“地区经合组织”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其次，作为欧盟“总统”的范隆佩不是来自德、法、英等欧洲大国，其当选的最重要素质是协调能力，换言之，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协调各方利益，听取各方意见，这个“总统”也可以被看做是“欧洲联合国”的秘书长。不可否认的是，在欧洲这个集中了太多实力相当的民族的“狭小”区域内，各国在经历了数百年流血冲突之后，在冲突中形成民族国家主权第一的基本原则之后，正在通过实行欧洲地区利益的一体化，逐步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努力创造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与稳定的新时代。然而，欧洲的民族问题仍然通过各民族国家维护各自主权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欧洲各民族之间的真正融合尚需时日，欧盟的内部稳定关系仍然非常脆弱。无论如何，在欧洲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我们的研究也与时俱进。“欧洲文化研究丛书”这一题目本身就寄托着我们的良好祝愿，希望欧洲人民在一体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同时也表达了我们对于欧洲文化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愿望。

我们这个项目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设立并由教育部资助的重点研究项目——“欧洲文化的兴起及其世界影响”（05JJD77019）。从项目申报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调研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思考如何作好相关的研究。经过多次集中研讨，我们确定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即按照专题开展研究。这个基本思路打破了目前常见的按照国别或者断代进行历史叙述的方式，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从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物质生活层面和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层面探讨问题。例如

在复旦大学教授李宏图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论》这本书中，作者侧重讨论欧洲近代思想演进的过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充分把握了欧洲思想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即在考察超越于个别国家之上的具有某些普遍性特征的“欧洲思想”的同时，也同样考虑了欧洲各国发展起来具有自身特点的思想观点，也就是注意到欧洲思想演进中的民族特性问题。另外，作者充分表述了欧洲政治思想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普遍性的观点，换言之，在注意到欧洲近代思想具有的近代时间维度的限制的同时，也深入分析了一些概念及其含义具有的超越时空的普世性。作者还注意到欧洲不同群体和不同党派对其政治思想的某些观念的不同理解，也就是实事求是地探讨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欧洲政治思想”这一相同概念的实际差异和不同人对此作出的不同理解。这样的研究观点在一般的欧洲政治思想史作品中是很难表达出来的。又如南开大学教授马世力等撰写的《欧洲近代经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书集中考察了隐含或显现于近代西欧社会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经济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诸问题，深入分析了指引与规定西欧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轨迹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意识、价值判断和伦理规范等。这些问题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是很难表达清楚的。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值得读者高度关注，他们认为欧洲市场经济文化有别于中古时期农本与自然经济文化，决定着西欧近代历史的走向，是欧洲近代文明与现代化的核心。南开大学哲学教授李建珊等撰写的《欧洲科技文化研究》突出了如下观点：一是认为欧洲近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是知识领域的革命，更是文化的和社会的革命，其发展的水平和性质越来越左右欧洲文化发展的水平和性质；二是对欧洲基督教作了客观的分析，主张欧洲基督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对于近代科技的产生具有承前启后的中介作用；三是提出近代以来的欧洲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创造性张力相互作用，使得人类的精神发展正在走向一个更高的文化境界，即建立多样性综合统一的新文化整体。上述观点的表达也许能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反映出来，但是通过专题研究性著作，表达得

更为直观和清晰。

为了丰富对于近代欧洲文化丰富内涵的研究，我们还选择了一些重要的方面作为研究的重点，或者说从某些个案研究中窥视其发展变迁。南开大学外国文学教授王立新等完成的《近现代欧洲文学艺术的发展及其影响》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重点探讨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欧洲文学艺术的发展。作者认为，近代欧洲文学艺术的兴起与近代欧洲文化的兴起相一致，标志着西方文学艺术的一次重大转变和飞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人逐渐从中世纪神权文化的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开始以人的眼睛观察世界，以人的理性去理解世界，以人的心灵和情感方式去抒写和描画世界，以人的意志去创造近代文明的辉煌。而欧洲现代文学艺术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变化，凸显出欧洲文化是在对传统的扬弃、反拨和超越中发展的，是一种在传承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王黎撰写的《欧洲外交史（1494—1925）》也是一个视角独特的研究。作者提出，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国际社会虽然不再以欧洲为中心，但就其外交机制、国际惯例以及国际法基本准则而言，均源于近代欧洲外交及其赖以存在的近代国家体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近代文化的影响力。作者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注意，从书名中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将1494年作为近代欧洲外交的起点，这与国内外学界以1648年作为近代欧洲外交史起点的观点不同。同样，在欧洲近代国家体系的基本特征、欧洲国际法等方面，作者均有独到的见解。郑玮博士完成的《雅典：从古典城市走向基督教城市》一书也是具体的个案研究，其中关于雅典基督教化的研究和一些观点也很新颖。

“欧洲文化研究丛书”作为教育部重点项目的成果虽然即将问世，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深知还有许多领域没有涉及或者涉及不深。例如，近代欧洲文化的来源问题在学界一直有争论，南开大学教授杨巨平等撰写的《欧洲文化起源研究》就是力图回答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欧洲”这个地理概念如果与文化概念相联系，欧洲文化就是一种地域文化，其发展是随着欧洲民族

活动范围的变迁而变动，即便在欧洲，其文化发展也是逐步由点到面，最终于 10 世纪前后实现了与欧洲地理的统一。而作为“欧洲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是不同时期和不同来源的希腊人共同的创造成果，因而马丁·波纳尔的希腊文化亚非之根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欧洲大陆渊源说、希伯莱说、日耳曼说等都有失偏颇。欧洲文化是欧洲及其周边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多种文化因素融合发展的产物。也许使用目前常用的一个说法更能贴切地表达出我们的想法，即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及提出的问题。本丛书提出的问题如果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进而引导青年学子进入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就感到满足，因为这也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

陈志强

2009 年 12 月 1 日于南开园

目录

总序 / 1

绪 论 / 1

第一章 英国革命时期的思想演进 / 25

第一节 新的科学，新的国家：霍布斯的思想 / 25

第二节 权力与革命：洛克的思想 / 39

第二章 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 / 61

第一节 什么是启蒙运动 / 61

第二节 “三权分立”：孟德斯鸠的政治设计 / 72

第三节 平等与主权：卢梭的政治理想 / 90

第三章 对法国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的反思 / 115

第一节 休谟对社会契约理论的批判 / 115

第二节 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评 / 127

第三节 约瑟夫·德·梅斯特论法国大革命 / 145

第四节 自由主义者的反思：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 / 168

第四章 民主时代的理论思考 / 177

第一节 “新的政治科学”：托克维尔的思考 / 178

第二节 社会的自由：密尔对民主社会的思考 / 196

第五章 欧洲思想界的转向 / 229

第一节 社会的进化：斯宾塞的思想 / 230

第二节 “和谐社会”：霍布豪斯的新社会 / 275

参考文献 / 303

后 记 / 319

绪论

在西方学术界，思想史一般被称为“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主要研究思想观念在历史中的演进和变迁，它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单位。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思想观念是历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历史的活动和展开不仅与思想观念紧密相关，而且在人们和社会进行某种活动时也都受到思想观念的限制，要在这样的记忆和既定的原则下进行。也就是说，他们跳不出现有的思想观念的约束。如果说历史是一种社会、政治和人们的一种实践的话，那么，思想观念也就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了历史进程之中，它与任何一种社会、政治的实践都有联系，并且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也创造了自身的历史。因此，要了解历史的话，就必须考察这些思想观念，从这一层面来更好地解释历史的变迁。

对什么是思想史，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一般来讲，思想史所说的思想既包括了人们思考后的成果，或者思考活动的产物，是一种明确的、清晰的、有一定表达方式的结构和体系，也包括人们的欲望、冲动、感性和想象等构成内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认为思想史包括“历史观念史”（常常在哲学的阐述上系统地研究思想）、思想史自身（研究非正规的思想、观念的氛围和知识的演进）、社会观念史（研究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和文化史（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研究文化，包括对世界的观念和集体心态）等内容。达恩顿还认为，这四个不同的层面体现着从“高”到“低”的递进，因此，他用“高”和“低”的两个中心概念来概括思想史所研究的全部

内容。^①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尔·夏蒂埃也认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事实上为所有的思想样式。^②

在长期的思想史研究中，学术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阿瑟·洛维乔易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并开始了观念史研究，他因此而被称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③ 1936 年，他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一书，^④ 他的研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的研究，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点。虽然这些观念可以被分开和重新组织，但一般来说，西方社会的人们都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在人类思想的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就成为基本的存在，成为思想演进发展的“伟大环节”，影响或者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正如洛维乔易自己所说，观念的基本同一性，和西方思想上的一以贯之的想法。^⑤ 也正像斯金纳所说是那些“永恒问题”。^⑥ 此后，洛维乔易还发表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1938 年）、“现在的观点和过去的历史”（1939 年）、“历史观念史的反思”（1940 年）等文，从方法论上进一步阐述了观念史的研究。

对于洛维乔易的观念史研究，有些学者指出，过去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创造或者谈论过“人类的伟大环节”这一概念，它是由洛维乔易自己所建构的。尽管如此，当时洛维乔易所提出的观点对思想史研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我们必须记住，无论是新开辟的“观念史”研究，还是原先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或者说居于主导地位的解释方法仍然是注重对经

①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37.

② 同 Dominick La 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 第 14 页。

③ Preston King (ed): The History of Ideas: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 Croom Helm 1983, P.8.

④ 此书已被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

⑤ 《洛维乔易观念史论文集》第 5 页。

⑥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载丁耘等编：《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元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0 页。

典文本的理解，特别是一些“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所以，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必然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斯金纳所说，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唯一的研究对象。按照这样的方法，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然后，历史学家便将几个思想家作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被当做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历史变化或发展。政治思想史因而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①同时，在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的解释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义，政治理论仅仅充任着在事后赋予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因此，对经典文本理论的研究将能够解答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这里，涉及政治理论或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问题，是先有政治观念还是先有政治行动。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为只是在其行为之后才被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赋予其合法性，或作了论证，并且伟大的经典文本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并在人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只有理解了它，才能够很好地理解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观念。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以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拉斯莱特为先导，波科克继之，到 80 年代的斯金纳成为代表。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把剑桥大学发展成为新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他们也在学术界被称为剑桥学派或历史语境主义，以至于有人将这场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型称之为“斯金纳式的革命”。^②

在这里，将对目前占据思想史研究主流的剑桥学派作一些详细介绍。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不满意于现有的思想史研究的解释模式，拉斯莱特

① 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载《世界历史》1990 年第 6 期。

② 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 页。

率先提出“哲学已经死亡”的口号，提出了要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史，并且让思想史成为真正的思想史。为此，他自己率先示范，借出版洛克《政府论》这部著作的机会，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详细的材料，运用类似于乾嘉考据学派的方式得出了全新的结论，洛克的《政府论》不是写于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而是在此之前的10年。写作时间的改变，对洛克《政府论》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同，其不再是为“光荣革命”而辩护，而是要迎接一场革命。这本书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改变了人们对洛克《政府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于，他提供了一种运用历史研究方法的范式。尽管后来学者们继续进行了深化，但是他的开启一个学派之功不可没。

很遗憾，拉斯莱特由于要去组建剑桥经济社会和人口研究小组，转向了人口和社会史研究，^①离开了思想史研究，从而未能将这一方向深入拓展下去。但沿着拉斯莱特提出的方法论，波考克则继续进行了推进。在他这里则使思想史研究实现了从“政治哲学史”到“政治语言史”^②的转换，初步形成了剑桥学派。奠定这一学派基础的是他所写的关于政治思想史方法论方面的几篇核心论文^③和在该方法论指导下写就的几部经典著作。

作为一种思想史研究范式，从方法论的高度对之进行系统思考的则是约翰·波考克。在奠定剑桥思想史学派研究范式的三篇论文中，波考克的《政治思想史：一种方法论的探讨》（1962）被誉为“预兆未来”的经典之作，其刊发时间比邓恩的《观念史的身份》早6年，比斯金纳的《观念史中的意义和

① 拉斯莱特在剑桥大学领衔成立了“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研究剑桥小组”（the 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并使之成为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研究中心。见 Melvin Richter,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Languages: Pocock, Skinner, and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y and Theory*, vol.29, No.1, P.3.

② 需要指出的是，在波考克那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哲学”都是不加区分地交互使用的，都是指同一个意思。在文中，特别是涉及引文的地方，为了保持原貌，作者并没有强行进行技术上的统一。

③ 如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 in Peter Laslett and W.G. Runciman (eds.),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Society*, 2ed series, Oxford, 1962; 'Verbalizing a Political Act: Towards a Politics of Speech', *Political Theory* 1(1973); 'Languag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J.G.A. Pocock,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London and New York, 1972; 'Political Ideas as Historical Events: Political Philosophers as Historical Actors', in Melvin Richter (ed.),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inceton, 1980; '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etier d' historien', in A. Pagden (ed.), *The Language of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1987;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J.G.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ambridge, 1985.

理解》早7年。^①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波考克首次提出政治思想的身份是历史的；在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我们所能采用的最恰当的方法就是历史学的方法；我们从政治思想文本中所解读出来的“意义”必须是一种经过历史学的方法而得到确证的意义。^②

正像波考克在1971年所说：“在过去的十年间，那些对政治思想体系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在他们的学科内亲历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这场变革实际上相当于一场转型。”对于这场转型，其目标就是实现从“哲学的解释”到“历史的解释”的模式转换。具体到思想史领域，就是关注“过去事实上发生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以哲学的解释为代表的种种非历史的解释所关注的则是“过去事实上所发生的事情对身处当下的我到底意味着什么？”^③波考克认为，我们不应该将两者等同或混淆起来。作为思想史家，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重建”某一特定的文本或言说的“历史意义”，也即，作为诠释者，我们所附加在文本或言说中的意义必须是该文本或言说呈现在特定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s）中的意义。当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在从事历史解释活动时，他必定会意识到，他和他的诠释对象并不是处在同一个“概念或意义世界”中。这样，为了确保解释活动的合法性，他必须要追问：在多大的程度上，其解释对象（也就是作者）对其词语的使用与他（也就是现代解释者）对其词语的使用是相一致的？因为从解释者的特定立场来看，他必定观察到，解释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必定是如彼特拉克所想象的那种交流：也即其与西塞罗（或李维）之间的那种交流：“你，来自你那个时代的世界，而我，则来自我这个时代的世界。”这样，为了避免“强人以就己”式的误读，为了能与作者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使用某些特定词语，我们必须从传统中寻找概念工具，并从事一种波考克所谓的“人文主义”的活动——也就是重建文本写作或言说行动所赖以展开的“意义世界”，也就是“用一种古人或先辈的那个时代的语

① Dario Castiglione and Iain Hampsher-Monk(eds.),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National Context*, P.159.

②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 P.188.

③ 同上，第7页。

——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论——

言来重述古人或先辈的思想，以便理解当如此表达的时候，他所不得不说或必定要说的，以及他所关注的”。^①但是，在波考克看来，在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实践中，这种历史的、人文主义的原则遭到哲学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②原则的玷污和背叛。用波考克的话来说，“20世纪的人讨厌把自己看作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他们不愿意从传统中寻找概念工具，而是宁愿构建自己的工具。”^③其结果造成了历史解释中的“背叛行为的兴盛”。这表现在：秉持操作主义原则的解释者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个作者在遥远的过去做某一表述究竟有何意指，而是其自身的当下状态可以使这一表述有何意味。他从事于解释活动并不是服务于作者的目的，而是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以霍布斯研究为例，在人文主义者看来，操作主义者往往只是借霍布斯之“酒杯”来浇自己之“块垒”，从而把霍布斯所不曾有的意图或不可能说的话人为地添加在霍布斯身上。所以历史学家常常向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抱怨道：“说这些话时，霍布斯并不是这个意思，至少并不确切地是这个意思。但是很可能你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发现它对你是有用的。但是不要在你的思想前加上‘霍布斯曾说过’这样的词语，更不要加上不诚实的现在时——‘霍布斯说’。”^④

在波考克之后，昆廷·斯金纳将剑桥学派的这一方法论成形，从而在学术界正式创造出了“剑桥学派”，以此为标志，斯金纳也成为了“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由于受业于剑桥大学，而且深受前辈学者拉斯莱特和波科克所提出的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史，这都给了斯金纳以极大的启发，他认真地阅读过拉斯莱特所编辑的洛克的《政府论》，也聆听过他的老师对此书的点评。与此同时，他特别喜欢波科克于1957年出版的《古代政制与封建法》这本书，

①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 P.8.

② 波考克区分了“人文主义者”和“操作主义者”。操作主义者的特征是：在与古人的“对话”中，他只“欲求抓住那些他注意到的一些言说行动，并用它来施行自己的语言游戏”。而人文主义者则“真正关注的是维持并肯定他与死者对话的价值”。见‘Political Ideas as Historical Events: Political Philosophers as Historical Actors’, Princeton, 1980; P.152.

③ 同上，第8页。

④ 同上，第8页。